

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

王观泉 著

# 郁达夫传





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

# 郁达夫传

王观泉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  
——郁达夫传  
王观泉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3插页 211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1072·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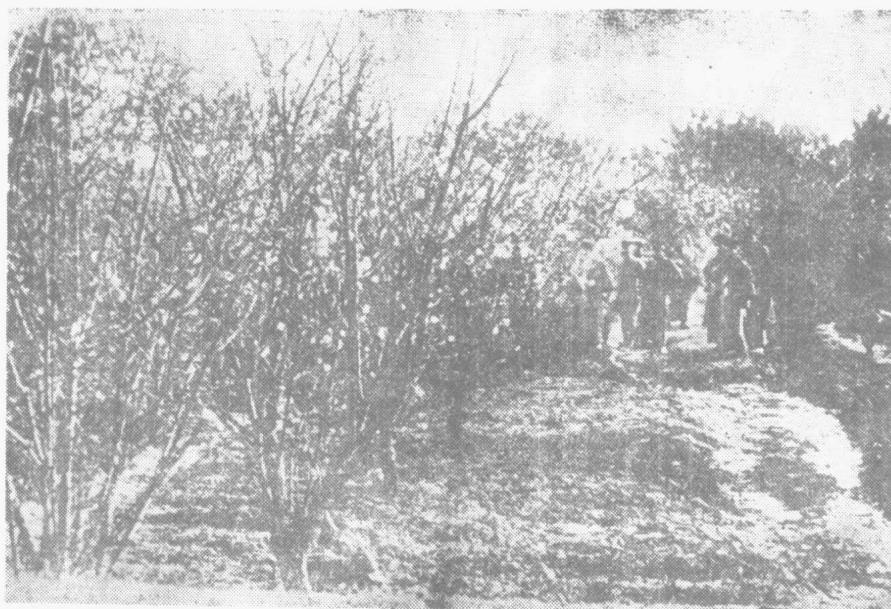
---

定 价：1.80 元

—谨以此书献给郁达夫  
烈士殉难四十周年



郁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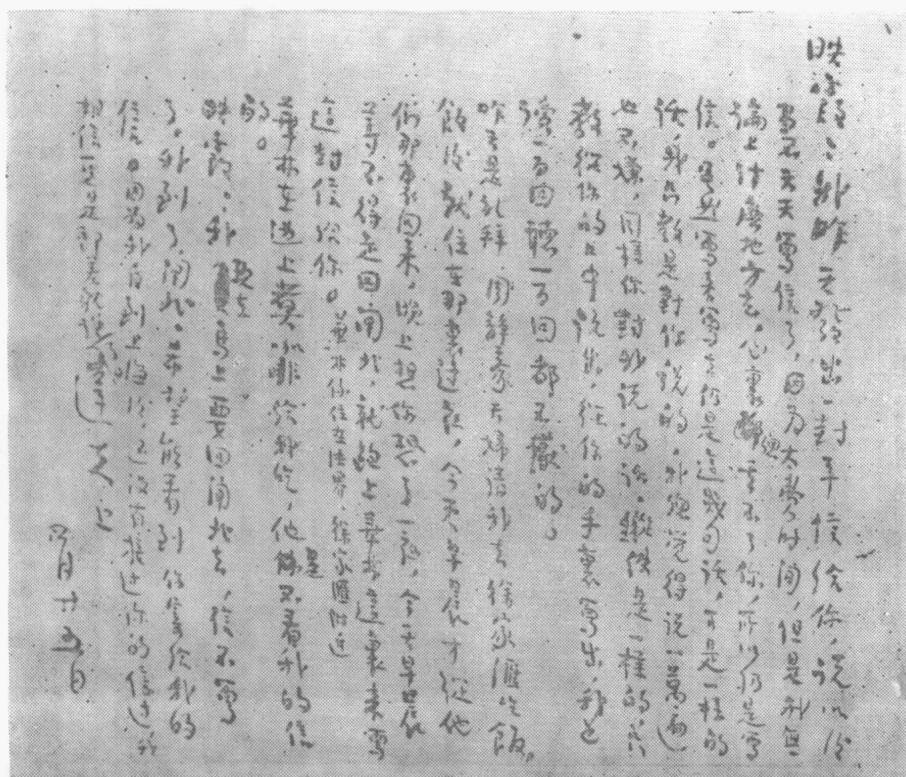
传为《沉沦》第五章所描绘的梅园实景——大喜梅林



郁达夫与郭沫若（前右二）、林英美子（前左二）、横光利一（后左二）等——1936年12月12日摄于日本东京日比谷公园山水楼



保存至今的达夫手书《星洲书店》匾额



达夫手迹——致王映霞

## 目 录

序言 .....	( 1 )
富阳人氏 .....	( 7 )
杭州读书 .....	( 21 )
日本留学 .....	( 30 )
沉醉文坛 .....	( 46 )
小说创作 (一)	
—— 《沉沦》 及其它 .....	( 64 )
理论贡献 .....	( 85 )
小说创作 (二)	
—— 《春风沉醉的晚上》 及其它 .....	( 128 )
附录：一篇佚失的小说残文及其它	
爱情苦甘 .....	( 170 )
畏友鲁迅 .....	( 199 )
美哉散文 .....	( 226 )
抗战烽火 .....	( 251 )
殉难异域 .....	( 269 )

## 序　　言

### 一、开篇之先

手头有两种贝多芬传，一本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一本是H·夏茀莱的《音乐的解放者——贝多芬》。

罗曼·罗兰的贝氏传在我国知识分子和文学爱好者中间可以说尽人皆知。夏茀莱的贝氏传就很少有人知道，连从事音乐工作的人知道此书者恐怕也不会很多，然而它却是一部逾六十万言的巨著。罗曼·罗兰的贝氏传不足四万言，连附录的贝多芬文墨加在一起也不足夏茀莱的贝氏传的十分之一，但它却是西方传记文学中的佼佼者。在短短的篇幅中，它把贝多芬主宰命运的顽强性格和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写得淋漓尽致。这样，一部音乐家的传记就超越了时空界限和职业上的隔膜，成为一部鼓励人们以最大限度的耐力和意志去战胜逆境，争取生存，获得大写的“人”字称号的巨著。当然，如果不了解贝多芬生平历史的读者，看罗兰所作是不够的，因为罗兰的笔主要不是写经历而是写命运，他要写出贝多芬“把神圣的苦痛的油膏，献给苦难的人”的伟大献身精神，也就是说，罗兰不是写这位“胜利的普罗米修斯”如何被锁在高加索山上受苦的经

历，而是写这位音乐的取火者禁锢不住的崇高的灵魂。罗曼·罗兰并非不了解贝多芬的生平，恰恰相反，他对贝氏的生平了如指掌。他是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欧洲那个腐败的封建贵族制度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激烈斗争和动荡无定的社会斗争中去锤炼贝多芬的。罗曼·罗兰笔下的贝多芬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一个精英，一种象征。

夏茀莱氏的贝多芬传写的是生平和作品的详情，但它也不是一般读者所能看懂的，因为太专门，太精到，太具体，读通此书并领略其美，不仅要具备高深的音乐理论修养，还要有相当大的耐读力。这是此书不易普及的唯一的一个原因。当然，夏茀莱的贝多芬传的学术价值仍是不可磨灭的。

上述两种贝多芬传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传记写作方法，是传记方法论方面的两个极端，一个精炼，一个广博。它们都是传记创作不易达到的高峰，所写成的传记也是“曲高和寡”的。通常的传记是既写传主历史也写传主精神，如果是作家传，就既写他生活经历和作品成就，也写出这个作家活动的时代潮流和思想活动。西方著名的文学传记作家如斯通的《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莫洛亚的《雪莱传》，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以及传主的家属艾·居礼的《居礼夫人传》等皆是；传主的生平历史和卓著的贡献概括齐全，篇幅适中，可读性强。

我国是有写传记（包括年谱，家谱，族谱，朝代史和地方志中的人物列传）的传统的。从精炼到几百字的《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到最近出版的长达数十万言的鲁迅先生的传记，十分丰富。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原因，近二、三十年来的传记写作不大兴旺，如今正处在重新开始的阶段，因而就目前已经

出版的传记来分析其写作方法，材料还不够丰富。又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纠缠，传记作者大多不太愿意写传主的生活和命运，作家传则只偏重于作品分析和编年索解。这当然也不能算是缺点。不过，我总以为，如能把作家的生活经历，喜怒哀乐的精神事业，和时代的动荡连同创作扭结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写，也许会别开生面。试试看怎么样？这就是这部《郁达夫传》写作方法论的一些交代。

## 二、容易和不容易

要为郁达夫立传，容易，也不容易。

说容易，郁达夫写有自传——写至去日本留学之时，有日记——时断时续记至一九三六年。他还写有创作回顾和自述生活的篇章，在怀念故人或表彰时贤的文字中亦时有对自己的描述。同时，郁达夫还确认文学作品多少总带有作家自叙的性质：他如是说，确乎也是如是写的。

说容易，除开郁达夫留下的自我叙述的文字外，还有达夫生前死后他的亲朋好友和患难与共的同志的回忆、纪念文章，这些都是为郁达夫立传的重要资料。这样说，写郁达夫传就容易了。

说不容易，原因也正在于可以足资立传作参考的第一手材料太多，一多就使写传的人感到棘手，因为怎么写也脱不出郁达夫自述或亲友回忆的范围，弄不好传记作者成了达夫自述的编纂者，大有孙悟空能耐再大也翻不出如来佛掌心之虞。这是一难。

再就是争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涌现的第一代著

名作家中，象郁达夫这样被争论不休、褒贬不一者，实在无出其右。在国外，有一部《郁达夫传》称达夫是“一个与世疏离的天才”，“与世疏离”当然就容易引起误解与争议。在国内，有一篇述评说郁达夫是“充满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本人“充满矛盾”，“易遭误解”就不足为奇了。史论家要对这样复杂的作家作出历史性的公正的评价，实在是相当棘手的，这是难写的原因之二。

难写的第三个原因，是郁达夫的著作和译品数量大，门类多，涉及面广。达夫以小说起家并负盛名于世，他写文学理论并留有专著，也写杂文、游记和诗。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到南洋，竟写起经济论文和军事分析文章来了，这在我国现代作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综其一生，优秀之作很多，不用讳言，无聊的东西也有一些。这反映了郁达夫一生的复杂的心境、生活遭际和世界观上的矛盾，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变的政治风云给作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重任和不幸。不少论及郁达夫的文章中一再否定他是颓废派。颓废而入流派，未必见得，但郁达夫颓废的思想、世纪末懒散的才子气质和名士派头的生活，却着实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很写了一些颓废气十足的作品，确也是客观事实。大凡这些都反映了郁达夫的复杂性，也就大大提高了为他立传的难度。

### 三、我如何处理这既难又易

传记写作，有时也显得颇为玄乎的。要为著作等身却很少为自己留下生平自述的作家立传，不见得难写：为这种作家写传记，作者的主动权较大。要给一个为自己留下很多生平自述

的作家写传记，不见得容易：这种作家他年年月月事事处处都为传记作者提示了“我是这样生活的”，传记作者的主动权就小了、少了。郁达夫是连自己的相貌都在小说中作了逼真的描写的：

他的面貌无俗气，但亦无特别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双比较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茫茫夜》）

一九三一年访问郁达夫写了著名的《郁达夫印象记》的匡亚明，在访问记一开头就证实了上述那段在《茫茫夜》中的于质夫的形象，就是郁达夫“自己的肖像”。这副尊容实在不俊，加上肺病、黄疸病、胃病的折磨，和经常酒精中毒而面如菜色，这就是地道的郁达夫了。

我如何写象这既难写又易写的作家呢？考虑再三，决计把造成容易写的资料和不容易写的因素统一起来加以掺合与分析，然后结合郁达夫的作品再进行综合研究之后，写郁达夫这一不必也不容任何“艺术加工”的历史存在。

郭沫若的《论郁达夫》真是知音的佳作。文中引李初梨的话，说“达夫是模拟的颓废派，本质的清教徒”。郭老十分欣赏，说“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自此，李初梨的评断不胫而走。应当说，这个评断是颇有见地的。但是细细品味此话，却也是很费解的。也许可以说，郁达夫那种愤世嫉俗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强烈的反抗情绪以及敢于对自己所作所为负责的精神，都带有玩世不恭的味道，使人想起奥尼金、毕乔林、罗亭这些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的人”形象，尤其使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那个愤世嫉俗的独行主义者魏连殳。要分析上

述这些由文学家创造的人物形象已属文学史上难而又难的题目，何况对于曾经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了“多余的人”文学形象的郁达夫，那更是不易啊！这样，我写的也许仍然是一部平庸的传记。

那么，放弃这个写作计划如何呢？不，不愿意。原因说出来也许有点可笑：非我能写也，是我想写也。其中也略带有一些赌气性质，这个赌气之由来就不在此赘言，已经写在传记里了。总而言之，此传是我对于这位在光明已经来临之期被黑暗席卷而去的不幸者的历史命运的主观认识：写的是郁达夫传，反映的是传记作者对于一个作家和一个时代的认识。

#### 四、对，就是他！

谁也没有见过耶稣，但是耶稣那副忧国忧民的愁容，是谁都认识的：对，就是他，从约旦河那岸走来了。人，不仅创造了神，而且创造同类——自然是出类拔萃的同类。传记，就是对于这出类拔萃的人的一个再创造。不易啊！

## 富 阳 人 氏

浙江省有个县叫富阳县，富阳县有座山叫鹳山；在鹳山山腰间有座亭子叫“双烈亭”——或称为“双郁亭”，这双烈亭纪念的是兄弟俩，一对革命烈士：大哥叫郁曼陀，小弟就是本传的主人郁达夫。

郁达夫是“五四”时代最早觉醒的知识分子，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

“百里钱塘路，清江入富阳”。富阳县是钱塘江上溯富春江的第一个县城，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秦王朝时县名随江名称富春县。到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三九四年）为避孝武帝之母宣太后阿春和其妻穆皇后春华的讳，改名富阳，距今已风尘一千六百载矣。

富阳县是小城，山明水秀，景色佳丽，有诗道：“山烟敛树色，江水映霞辉”。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典型江南城市。梁代吴兴人吴均在《与宋元思书》中有一段盛赞富阳的话：“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隔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

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郁达夫很欣赏吴均此文，曾引在《还乡后记》上作为文章开篇。郭沫若更欣赏此文说尽了富阳的明媚风光，进而说道：“达夫是生在这样的地方的人，我相信他的诗文清丽是受了这种客观环境的影响”（《郁达夫诗词抄·序》）法国哲学家泰纳的关于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自然地理气候环境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

“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自述诗》十八之四）吟诵富阳的诗说古道今，如此绘声绘影，近人除郁达夫外，还真找不出第二家。

县城中顺着自西向东流向的富春江，有一繁华的通衢，它的每一条南北向的里弄都通向富春江，都是一个喧嚣热闹的小码头。在这数十条里弄中有一条叫满舟弄（现改为达夫弄），入得弄内左侧第一曲座南面北的黑墙门就是郁宅。郁达夫就诞生在这幢三开间二层楼的庭院里。

大哥郁曼陀，名庆云，后改名华，生于一八八四年，是我国最早出洋在日本留学研习法律，引进资产阶级法制的著名的法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上海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任内，被汪伪特务暗杀身死。由于郁达夫三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幸去世，“长子代父”，因此郁曼陀对于达夫的成长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本传将多次提及，这里略作交代。二哥郁养吾，名浩，先学陆军操练，后毕业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洋军阀时期曾任职于海军部，约在一九三〇年回家乡挂牌行医直至一九七一年去世。郁达夫排行第三，为“奶末头”，名文，小名荫生，生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清光绪二十二

年阴历十一月初三）。

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十年是我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致使清帝国已经很难维持其统治的年代。日本和沙皇两大帝国发动的日俄大战，在辽东半岛拼刀动枪，倒霉的还是中国国土和人民，中日甲午战争更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的损失和奇耻大辱。身受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清朝残酷统治的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也正在这时酝酿革命起义。在殖民压榨和人民革命浪潮中妄求生存而改弦更张的清王朝，则接受洋务派和改良派的建议，搞君主立宪，办工业，修铁路，练新军，兴新学，派遣留学生。在这三者——帝国主义侵略，革命和王权统治纽结在一起的多事之秋里出生的人，日后证明不乏怀有救国救民思想的革命家和志士仁人，除了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生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以及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钱玄同，郑振铎，朱自清，闻一多，邵飘萍，邹韬奋等等革命家和文学家，皆出生于上世纪末端，启智于辛亥革命而成熟在“五四”运动，终于成为现代革命历程中的风云人物。郁达夫也是其中的一员，最后牺牲在民族解放战争之中。郁达夫受人敬仰不只因为他是一位文学家，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位革命烈士。“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摘自《离乱杂诗》），正是达夫的自我写照啊！

郁达夫祖辈一直是以教书塾和行医为业，以所谓的教书先生和郎中先生受到乡邻的尊敬。这种职业虽有益于社会却肥不了自家，因此郁家很少置地产，他们重视儿孙辈的学业长进，用现代语言来说是重视智力开发，靠学问吃一口清高而素淡的饭。到了祖父辈开始家道中落，父亲郁企曾（字士贤）艰苦撑

,